驳《水浒》评论中的一种错误观点

历史系《中国古代史稿》编写组

毛主席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的作者通过塑造宋江这个典型，歌颂投降派，歌颂投降哲学，歌颂宋江的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路线，确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鲁迅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宋江是“奴才”；“不反对天子”——接受“招安”——替“国家”打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就是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三部曲。这条路线的要害就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但是，过去在《水浒》的评论中，却有这样一种论调，说什么《水浒》中的宋江，是“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在他身上具有农民阶级的“双重性”，即“反抗性和妥协性”。反贪官的“反抗性”，促使农民起义事业“发展兴盛”；而不反皇帝的“妥协性”，又是“农民阶级的阶级局限性”所决定的。他们肆意“修正”马克思主义，把宋江这个投降派，说成是农民阶级的革命派；把宋江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投降主义，说成是“农民的局限性”，并宣称这种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这种根本违背鲁迅评论的错误观点，打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旗号，流毒甚广，影响极坏，必须逐个彻底批判。

宋江反贪官的“反抗性”，果真是农民阶级的革命性吗？不是，绝对不是。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宋江反贪官，是以不反皇帝、拥护皇帝为前提的。“忠为君王恨贼臣”，道破了他忠于皇帝和反对贪官之间的主从关系。宋江之所以反对“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个贼臣”，只不过是为“至圣至明”的宋徽宗“整顿朝纲”，修补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维护封建赵宋王朝的反动统治效命。

宋江打着反贪官的旗号，同高俅等展开时而厮杀、时而乞求的斗争，目的是争得“官爵升迁”、“封妻荫子”，在统治集团中捞上一席地位。很清楚，**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根本不是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宋江反贪官的“反抗性”，与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革命性，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

宋江打着反贪官的旗号，在梁山泊起义军中干着破坏革命的罪恶勾当。正是以反高俅等“滥官污吏”的所谓“反抗性”，掩盖着他同高俅之间同属地主阶级的实质，掩盖着他们之间的地主阶级内部斗争的性质，从而篡夺了农民革命的领导权，最后把起义引向毁灭。这种所谓“反抗性”，不仅不能促进农民起义事业“发展兴盛”、没有丝毫革命性可言，而且，它实质上正是地主阶级瓦解农民革命、实行“剿抚兼施”的反革命两手中十分恶毒的一手。

在工人阶级产生之前，封建社会内部，农民是最革命的阶级。农民阶级的革命性，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所决定的。作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主要创造者的劳动农民，受地主阶级及其封建国家的残酷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过着奴隶般的悲惨生活，要解除这种封建的剥削和压迫，就必须推翻封建统治。因此，作为阶级斗争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决不只是反对个别贪官污吏、地主豪绅，必然反对整个地主阶级。在封建国家里，皇帝是最高的统治者，他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一切封建官吏的总后台。要反对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就非反对皇帝不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绝不是真正的农民革命，而只能是对农民革命的"修正"。

毛主席指出："**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历代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代表农民革命路线的纲领口号，总是把矛头直指地主阶级的总代表——皇帝。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革命战争，就明确地提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以及"大楚兴、陈胜王"的斗争口号。其后的农民革命，又先后提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漫天王"以及"天补平均"、"冲天大将军"等反封建的革命口号。就《水浒》来说，晁盖"托胆称王"，立志"要和大宋皇帝作对"；李逵要"杀尽天下不平人，砍尽天下不平事"，直至"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矛头都是直指地主阶级的总头目，这才是农民阶级革命性的表现。

正是具有反对地主阶级、反对封建皇帝的革命性的农民革命英雄，奋勇杀敌，英勇作战，才促使农民革命事业发展兴盛，从而把一个个腐朽的封建王朝葬入坟墓，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那种把农民阶级的革命性，偷换成为宋江的"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反抗性"；把农民革命事业发展兴盛的功绩，归之于宋江的"反抗性"：实质是以偷梁换柱的卑劣手法，歌颂投降派、美化地主阶级、抹煞阶级斗争，是道道地地的历史唯心主义。

宋江不反皇帝的所谓"妥协性"，果真是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吗？不是，绝对不是。

相对于近、现代工人阶级，中世纪的农民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但决没有必然向地主阶级投降的这样一种"局限性"。梁山泊农民革命英雄李逵，由于缺少阶级分析的观点，虽没有壮烈牺牲在高俅的屠刀之下，却让宋江用毒酒断送了性命，这是革命人民值得永远记取的惨痛教训。缺少科学的阶级分析观点，正是中世纪农民存在的时代的、阶级的局限性的一种反映。但是，宋江的"妥协性"根本不是这些。

宋江的所谓"妥协性"首先是不反皇帝。秦末、汉末、隋末、唐末等等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是反皇帝的；晁盖、李逵是反皇帝的；方腊起义是一支"不'替天行道'的强盗"，也是反皇帝的。所有一切真正的农民革命斗争都是反皇帝的。不反皇帝的"妥协性"，无法挂在农民的阶级性上，它只能是宋江的地主阶级本性。

其次，宋江的"妥协性"表现为接受招安，也就是投降。列宁在斥责无耻的奴才时写道："**津津乐道地赞赏美妙的奴隶生活并对和善的好心主人感激不尽的奴隶是奴才，是无耻之徒。**"这种叛徒和奴才的勾当，必然要遭到广大革命农民的强烈反抗。拿《水浒》第七十五回描述的招安场面来说，钦差大臣陈宗善"奉旨"来到梁山泊招安，当即遭到了以李逵为首的义军革命将领的反对。那个曾经骂过"招安，招安，招甚鸟安"的"黑旋风"李逵，气得"从梁上跳将下来"，一把抢过"皇帝圣旨"，"扯得粉碎"，"揪住陈太尉，拽拳便打。"这不是什么"粗暴"个性的暴露，而是反对投降、反对招安的农民革命性的鲜明表现。宋江叛卖成功，"当时辞去

的，也有三五千人”。事实证明，接受招安的所谓“妥协性”，根本不是什么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只能是宋江等一小撮投降派的本性。

不反皇帝，接受招安，正是宋江的地主官僚地位和他同高俅之间地主阶级内部矛盾的性质所决定的。《水浒》中的宋江，出身于地主家庭，“自幼学儒”，“曾攻经史”，当过押司，“刀笔精通，吏道纯熟”，是一个满脑袋孔孟之道的封建官僚。失意时，指责革命农民是“不忠不孝”，“犯了迷天大罪”；得意时，要把起义农民斩尽杀绝，“剖腹剜心”，这个仇恨革命达到疯狂程度的家伙，根本不是什么“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而是钻进农民革命队伍里的内奸、叛卖农民革命的死敌。只是由于“奸”逼“忠”反，宋江“权借水泊”，“随时避难”，但他“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时时不忘“尽忠报国”。梁山义军奠基人晁盖一死，他就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迫不及待地篡改了梁山义军的革命路线。随后，他炮制效忠诗词，宣布乞降“声明”，排斥革命将领，网罗贵族豪强，进而行贿赂，通关节，向钦差陈太尉献策，对俘虏高俅求饶：奴颜婢膝、凄凄惶惶，一切为了争得招安，一切为了叛卖、投降。在宋江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十足的奴性、地主阶级的反动性，那里只是什么“妥协性”！

“不反对天子”——接受“招安”——替“国家”打不“替天行道”的“强盗”，从始至终，贯穿着彻头彻尾的地主阶级的反动本性。把这种反动本性，轻飘飘地提为“妥协性”，进而硬塞到农民阶级的身上，诬指为“农民的局限性”。这实质上是把叛变、投降的可耻行径，向农民阶级栽赃，藉以既丑化农民革命，又为叛徒、投降派等开脱罪责。这种“理论”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十足的历史唯心主义、修正主义。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遵循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农民阶级的革命性和局限性，决定了历史上农民革命运动发展的必然逻辑：革命，失败；再革命，再失败；再革命，直至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正确领导下，打倒地主阶级，推翻封建制度，取得农民革命的胜利。这就是历史的唯物主义观点。相反，按照所谓“接受招安”是无可非议的“农民的局限性”的说法，那么，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农民革命运动的逻辑一翻而成为：“革命”，投降；再“革命”，再投降；永远做地主阶级的奴才。这样一个荒唐、反动的逻辑，恰恰证明了这个“理论”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反面的历史的唯心主义。

对《水浒》评论的这种历史唯心主义观点，是以偷梁换柱、颠倒黑白的卑劣手法，把叛徒与奴才宋江，美化为“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成为“形象化”了的农民阶级阶级性集中代表的“典型”：“反封建”的“农民革命英雄”。从而抹煞了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根本界线；抹煞了坚持农民起义革命路线同坚持投降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的两条路线的原则斗争，把斗争不屈而失败同追求升官发财而投降说成是一回事；把“英雄”和叛徒，合二而一。因此，它是在宣扬阶级调和；是在美化叛徒、丑化革命；是在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修正”；是打着“历史唯物主义”旗号的历史唯心主义；是修正主义。

今天，我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批判伪装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唯心论，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就是要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把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推向前进。